

#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2012—2022 年

## 区域国别研究回顾与建议

王春岩 尚宇红

摘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自 2012 年建立以来，至 2022 年已走过 10 年的发展历程。本文旨在回顾和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围绕中东欧国家所进行的研究，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系统梳理了 2012—2022 年我国中东欧研究机构与学者、研究成果的产出及学科分布特征等情况。研究发现，中东欧国别与区域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显著提升，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通晓该地区的专门人才缺乏，研究方法单一，学科交叉不足等。本研究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提供战略层面的参考，也为中东欧国别区域视域下的学术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东欧；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研究

### 引言

2012 年 4 月 26 日，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波兰华沙举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 12 项举措，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就此启

航。截至 2022 年，该机制已运行 10 年。也是在这一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一级学科，强化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职能(王铭玉、张艳凤，2023;郭英剑，2024)。在笔者看来，有必要从多学科角度，对我国学者在 2012—2022 年围绕中东欧所作的研究进行回顾，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般而言，“中东欧国家”是一个兼具政治与地理意义的概念，在地理上包括中欧 4 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南欧 7 国(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黑山、波黑、塞尔维亚)，以及处于中欧和东南欧之间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朱晓中，2014)。本文仅考察涉及以上 13 个中东欧国家的研究，并不涉及已经退出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波罗的海 3 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 2019 年加入的希腊。

我国的中东欧研究在学术上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兴起的东欧研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我国的东欧研究主要致力于介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80 年代则主要关注东欧国家经济领域的改革。1989 年前后，东欧剧变，我国的东欧研究因而开始关注制度转型，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把“东欧”国家称为“中东欧”国家，突出了概念背后的地理属性。2012 年之后，在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双重作用下，学界对中东欧国家的关注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孔寒冰、韦冲霄(2017)认为，2012 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那时起我国的中东欧研究至少在表面上

开始独立存在。如图 1 所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10 年，中东欧研究在数量上增长缓慢，论文发表量年均 50 篇左右；2010 年后研究数量骤增，2017 年达到高峰，之后则有所回落。本文将首先回顾和分析 2012—2022 年我国从事中东欧研究的主体（机构与学者）特征，随后考察图书成果和核心期刊论文成果两方面的内容，观察不同学科参与中东欧研究的方式和研究成果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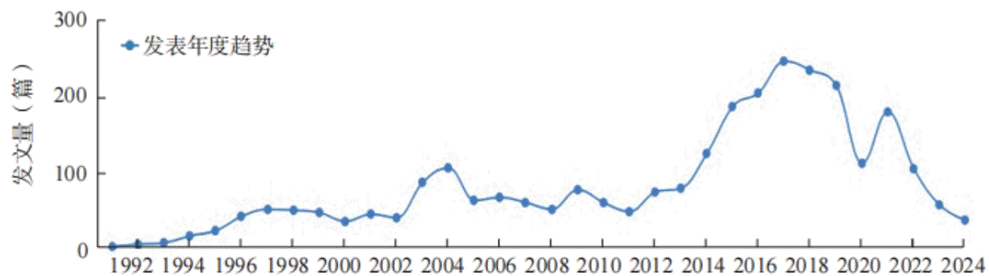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中东欧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历史变化曲线图

## 一、中东欧研究的主体

2012—2022 年，我国的中东欧研究经历了研究机构数量迅速增加和研究队伍快速壮大的过程。

### 1. 2012 年前中东欧研究概况

2012 年之前，我国专门进行中东欧研究的机构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代表性的学者包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欧研究中心的孔寒冰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朱晓中研究员等，这批学者的研究在中东欧地缘政治关系论述、区域特征把握和国别个案分析等方面均具有极高价值。他们曾对中东欧研究的学科历史与发展进行过梳理（如朱晓中，

2017;孔寒冰、韦冲霄, 2017), 可以被称为中东欧国别区域研究学科的奠基人。此外, 在国别研究方面, 有从事南斯拉夫研究的马细谱、从事罗马尼亚研究的高兴和从事捷克研究的姜到等学者, 他们在中东欧基础方面的研究工作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前 10 年, 随着国家关注点转向欧美国家, 我国中东欧研究出现了相对冷清的局面, 对中东欧国家的研究成果明显萎缩, 研究人员大量流失, 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徐刚, 2020)。

## 2. 2012 年后的研究机构与研究者

从研究机构方面来看, 自 2012 年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建立以来, 相关研究机构不仅数量快速增加, 而且出现了学科特征明显的研究中心。2012—2022 年, 中东欧研究机构在全国迅速发展有近 50 家, 他们进行了大量相关研究, 其中具有影响力和明显机构特征的研究有: 同济大学的中东欧国际关系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中东欧经贸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语言政策研究等。此外, 还有 3 个研究机构的视角别具一格: 第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在匈牙利的中国-中东欧研究院, 该研究院的研究以在当地搜集的一手资料为基础, 可靠性和时效性值

得肯定; 第二个是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中东欧经济研究所, 该研究所汇集了众多金融和企业界精英, 从 2017 年起持续发表中东欧国家年度宏观经济指标以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情况, 成

果具有明显的面向跨国企业和海外市场的务实特征；第三个是科技部在宁波设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研究中心，由于受到浙江省的支持，主要面向该省中小企业进行中国-中东欧的对接研究，具有务实取向。然而，除了以上特色鲜明的研究机构外，迄今为止大部分机构的研究成果特征还不够明显，有一定同质性。以上提及的机构之所以具有特色，拥有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业等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是重要原因。如果国别区域研究只面向国家层面产出宏观分析数据，自然难以满足国家、地方、行业和企业等不同层次的需求。

从研究者方面来看，新近加入中东欧研究的学者与老一辈研究者有明显差异，他们掌握不同的学科理论与研究工具，在各自的领域内聚焦中东欧国家研究。与老一辈学者相比，中青年学者较擅长进行量化研究和大数据分析，多从宏观视角把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特征。图 2 显示的是 2012—2022 年从事中东欧研究的主要学者，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作奎研究员关注中东欧国家华人华侨、交通运输和电子商务发展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新研究员借助设在匈牙利的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针对中东欧国家对华态度和企业营商环境等问题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研究；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姜建清以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尚宇红、张琳和张娟等使用大数据进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研究。



图2 2012—2022年从事中东欧研究的主要学者（来源：中国知网，2023-07-02）

但是，目前各个研究中心的中青年研究者队伍中仍严重缺乏真正了解中东欧国家的学者。这些中青年研究者多半从各自学科角度开展中东欧研究，一般没有在中东欧国家常年学习和生活的经验，不了解当地语言，并非深谙中东欧国家状况的学者。从研究方法上看，由于少有能使用非通用语搜集资料进行研究的能力，绝大多数学者依靠英文二手资料和大规模数据进行量化研究，难以深入国别区域对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深入解析。掌握当地非通用语的学者不仅数量奇缺，而且多不具备使用当地非通用语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能力。

## 二、我国中东欧研究领域的图书成果

如图3所示，在2012—2022年出版的中东欧研究书籍中，经济与贸易排在首位（占比为38.37%），其次是政治和法律（占比为28.30%）。这3个学科的总和超过出版图书总量的65%，其他学科的研究数量均在10%以下，学科分布不均匀的特点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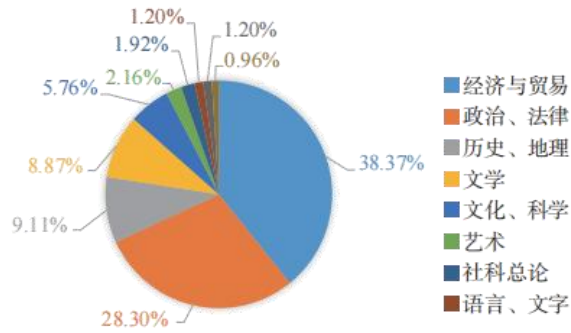


图3 2012—2022年我国中东欧研究相关图书成果的学科分布 (来源: 超星发现, 2023-07-02)

采用经济学科视角的图书主要关注中东欧国家贸易状况、投资环境和地方合作等主题(如尚宇红、张琳, 2013; 刘作奎、韩萌, 2021)。姜建清(2021)主编的年度《中东欧经济研究报告》提供了中东欧国家每年的经济数据。此外, 林业、能源和科技创新等专题研究的书籍也有出版(如张建华, 2020; 邱强, 2021)。而在政治学领域, 学者多关注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特征(姬文刚, 2020)、转型过程中经济社会的运行状况(如朱晓中, 2017; 高歌, 2022), 以及中东欧地区的大国博弈(如杨焯、高歌, 2017; 宋超, 2019)。

历史学科方面出版的书籍很少, 相关学者多关注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过程(如朱晓中, 2017), 以及捷克、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科索沃地区的历史(如陈志强, 2016; 孔寒冰, 2018; 马细谱, 2020a; 马玉琪, 2021)等主题。法学学科的相关研究则主要限于对中东欧国家的竞争法、知识产权法等介绍(如管育鹰, 2017; 应品广, 2017)。

其他学科的著作散见于文化领域的介绍(如周超, 2019)、中国语言文化在当地的传播(如牛利, 2017; 丁超, 2019), 以及人文

交流状况(如黄平、刘作奎, 2017)等。在文学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欧语系(现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曾经是中东欧文学研究的两个重镇, 但目前研究者寥寥。除了翻译出版的文学著作外, 2012—2022年共出版了3本文学史著作, 分别是冯植生(2013)纂写的《匈牙利文学史》、张振辉(2019)纂写的《波兰文学史》、杨敏(2018)主编的《东欧戏剧史》。由于人才短缺, 中东欧文学研究的断档情况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

综合介绍类书籍有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列国志”系列和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的“一带一路”中东欧国家概况系列图书。这两套图书均以国别为单位独立成册, 对中东欧国家的介绍比较宽泛。

综合年鉴类有北京外国语大学主编的“中东欧蓝皮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中东欧国家年度回顾与展望”系列图书。这两套图书综合整理了中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外交领域的年度大事。

从图书出版内容来看, 2012年以后, 经贸、人文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成为中东欧研究的重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中东欧研究的主线, 许多针对中东欧国家概况和国情的研究也都是围绕合作机制展开的。这一点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有很大的区别: 传统的研究以政党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 历史语言次之, 国别研究多于区域研究(徐刚, 2020); 2012年之后的中东欧研究则以经贸合作为核心, 其

他研究为辅助，区域研究成果集中涌现，但是国别研究中的语言、文学、历史和社会等基础研究方面的专著严重缺乏。

### 三、我国中东欧研究的核心期刊论文成果

核心期刊论文的学科构成比例与图书构成比例类似：经济与政治相关学科占有所有研究的 90%左右，其他学科约占 10%。

在 2012—2022 年期间，关于中东欧国家经济贸易情况的核心期刊文献共 231 篇，可分为双边贸易、投资和经济综合分析三大类，其中双边贸易类文献占比高达 61%，主要探讨双边贸易的潜力、互补性、便利性和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研究双边（直接）投资的论文占比约 30%，集中研究投资环境、便利化和影响因素等问题；其余经济综合类分析论文占比不到 10%，重点关注双边经贸关系、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以及个别市场等问题。

政治学领域的核心期刊文献有 89 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院为主要阵地。主题涉及中东欧国家与周边大国的关系（如朱晓中，2014）、中东欧“回归欧洲”的历程（如孔寒冰，2014）、加入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孔田平，2014）以及转型中的政治特征（如姬文刚，2015；徐刚，2021）等问题。在国别研究中，学者针对波兰和匈牙利开展了大量的外交关系与政党政治研究（如姬文刚，2019；马骏驰，2020）；针对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研究中，科索沃问题、语言政策问题是主要关注点（如徐刚，2013；兰剑、商红日，2018）；对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研究则很零散（如高歌，2017；马细谱，2020b）。总体而言，除了姜琳

的捷克研究(如陈广嗣、姜琳, 2005; 姜琳, 2018)和孔寒冰的阿尔巴尼亚研究(如孔寒冰、张卓, 2015; 马乔·拉科洛里、孔寒冰, 2017)具有持续性之外, 对其他国家的研究缺乏持续性关注与战略性分析。此外, 奥匈帝国的民族关系(如高晓川, 2015)、大国在华沙问题上的态度(如胡舶, 2014)等是为数不多的历史研究。

文学方面的核心期刊论文仅有 9 篇。社会科学院几位学者的年度东欧文学报告介绍了捷克、匈牙利、克罗地亚、黑山和马其顿的文学发展(高兴, 2011/2016; 舒荪乐, 2018)。除此以外的论文皆为翻译作品。语言教育为近几年兴起的研究领域, 分为对外汉语教学和非通用语教学两个部分。在语言教育方面, 孔子学院的建立与出口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如潘文荣、刘英, 2019)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 让人耳目一新。新闻传媒方面的研究有 15 篇, 其中鞠维伟(2019)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中国形象进行了研究; 张莉、张晓旭(2020)利用大规模调研数据, 分析了中东欧国家涉华舆情。这些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但是文章只停留在对现象进行表面描述的层面, 没有从历史、文化价值观等角度进行深层次的原因解析, 这从侧面反映出研究者学科交叉能力不足的现状。

总体上来看, 在 2012—2022 年间发表的论文成果中, 研究话题与“16+1 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密切相关。这些成果对于中国民众了解中东欧国家、提升中东欧研究的地位、加强中东欧研究的学科建设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成果涉及领域比较全面, 现实感很强, 有较大的应用性, 可以为中国企业进入中东

欧地区发展经贸关系提供参考。但是，应用研究蓬勃发展的另一面是对中东欧国家基础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缺乏，以及研究者学科交叉能力的不足。

#### 四、中东欧研究的总体特征与未来建议

在前文中，我们回顾了 2012—2022 年间从事中东欧研究的主体(机构与学者)及其图书与论文成果。这 10 年的中东欧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研究机构数量增加，但特色机构少，存在同质性问题；研究队伍扩大，但对中东欧国家有深入了解的学者少；善用大数据宏观分析的研究多，进行田野调查的研究少；借助通用语的研究多，使用非通用语获取一手资料的研究少；涉及应用的研究成果多，涉及基础学科的研究成果少，学科之间交叉互补的研究少。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对未来中东欧研究的发展就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平台的搭建和成果评价等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 1. 研究队伍：亟需培养具有非通用语应用能力的专业学者

开展国别区域研究需要一批既懂当地语言又具有其他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一个高水平的区域国别学者不仅应该掌握研究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应该具有使用当地语言获取第一手经济和社会资料的能力。中东欧国家语言各不相同，能够使用这些国家本族语言开展研究的学者在我国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中青年学者采用通用语和

二手数据进行研究，资料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都无法保障。2012年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吉林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了一系列中东欧国家语言课程，但非通用语本土教师缺乏，毕业生大多不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兼具语言和研究能力的学者短缺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选拔派出学生赴相关国家学习、定向培养非通用语师资的做法值得提倡。教育部(2015)印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指出，可以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适当聘请外籍研究员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这也是充实研究队伍的一个办法。中外互动式的研究也可以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渠道。

在培养高质量和可持续研究队伍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 University)的经验。该大学下设中东欧学院，招收本科学生，聘请大量中东欧国家的学者任教和进行研究，除开设语言、文化、历史和经济等课程外，还外派学生前往中东欧国家学习进修，类似于我国各外国语大学开设的欧洲学院或者阿拉伯学院。聚集多个国家众多学科的学者，同时进行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可以破除目前我国中东欧研究仅停留在学术层面而无法实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与学术科研相结合的弊端。

## 2. 研究方法：亟需深入国别进行田野调查

《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提出，要持续

追踪、综合掌握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动态和趋势，特别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深入对象国或地区的腹地开展田野调查(教育部，2015)。但中东欧国别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冷学”，从语种设置到研究经费都远不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目前的中青年学者很少有扎根对象国深入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状况、进行田野调查的动机和条件。

以经济研究为例，大部分研究人员是从其他专业跨界过来从事中东欧问题(主要是经贸问题)研究的。严格地说，无论是对中东欧地区国家的了解，还是其知识构成，这些研究者都有所欠缺，还不能胜任真正的中东欧研究。学者们使用的分析指标往往是建立在普遍经济理论之上的传统指标，也就是用经济领域的研究方法，观照中东欧国家的数据样本。这样的研究过程抹杀了中东欧的特质，很多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并不匹配，缺少应用价值。国别区域研究中心应以资政服务为宗旨，培养大批可以满足国家重大政策研究需要的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人才。学者的首要任务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聚焦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个领域，展开田野调查，跟踪、分析、预判该领域的动态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可靠的政策咨询。

### 3. 研究内容：应该加强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

区域国别学的最大特征是多学科性，这成为其入列交叉学科的必要前提。区域国别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 and 军事等方面进行的深入交叉研究。仅关注经

济贸易，或者仅关注政党政治、历史文化，并不能充分解读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社会问题或现象。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真正抓住和解释一个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全部真相。真正系统的中东欧国家研究不能脱离深入中东欧社会的基础研究，对于对象国或地区的人文知识缺乏了解的研究者也不能成为优秀的区域国别研究者。如果缺乏对中东欧地区扎实的基础研究，并对这一地区日益显著的多样性没有基本认知，对中东欧国家的研究便无法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目前，外国语言文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和法学等与区域国别学密切相关的一级学科鲜有对融合问题的探讨，未能形成多学科普遍介入的局面，这导致一些研究仅停留在现象的表层，而无法作深层次的因素分析，或者只能采用一般的理论生搬硬套。

例如，中国外文局发表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企业形象”全球年度调查报告非常有参考价值，但是少有研究能运用历史、社会和文化等基础学科知识对调查数据进行解读，或者应用调查数据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我国国家形象与企业形象的策略。也就是说，在新闻传播学科视野下，很少有学者能融合其他国别知识与分析方法展开纵深研究。在经济研究领域，虽然偶尔可以见到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如关注文化距离对经贸活动的影响(如尚宇红、崔慧芳，2014)、孔子学院的数量与贸易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如江群航，2024)等，但绝大部分研究并没有显示出学科之间的相互观照。

#### 4. 研究平台搭建：应该以国家重大项目为抓手，实现学科融合

借助重大项目的研究平台，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共同发展，是国别区域研究的优势。2012—2022年，中东欧研究所获得的基金数量较少，而且学科分布并不均匀。这10年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共有23个中东欧研究项目，平均每年2项。在这23项研究中，经济学与语言学研究各占1项，其余均为国际政治与历史研究。基金数量的不足导致很多研究中心基本上都以兼职研究员为主，因此，难以保证研究的活跃度。从前文的研究成果统计数据来看，2017年之后，我国中东欧研究的数量有一定回落，这与研究中心经费不足、难以支撑持续性研究有关。考虑到中东欧各个研究中心的侧重点不同，学科优势与劣势明显，未来的中东欧研究应以国家重大项目为抓手，跨研究中心组织优势学科学者进行研究。

政府在项目组织上应进行统筹，以起到引领作用，并赋予研究中心服务公共政策的职能。各机构应有清晰的定位，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同时应引入政府与研究机构学者的双向交流机制，使学者能够把握政策的前瞻性与创新性。在运作经费的来源上，既可以采用项目申请的办法，也可以采用向政府相关部门出售智力产品的方式来获取研究经费。此外，还应探索企业资助的民间研究机构的建设渠道，促进多元化研究中心的发展，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 5. 研究评价：应该提高战略性资政报告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

提升战略性资政报告的重要性，完善多元化评价体系，是保障国别区域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一般而言，在我国高校中，在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和出版图书是学术评价的主要内容。这种传统的评价方式与国别区域研究的主要任务存在差距。对国别区域研究而言，其重要任务是服务我国全球国家战略安全的需要，捕捉各国的政治经济热点，对之进行描述、分析并提出应对策略。这类关注热点与应对策略的文章往往短小、及时，但很难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导致战略性对策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仅涉及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无法描述中东欧战略性资政研究的现状。从公开的资料看，目前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东欧研究所的数据平台有政治热点跟踪，从事 EMBA 教育的上海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能够及时提供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资讯月报，而在其他研究中心，热点跟踪和分析性文章较为少见。而国外研究机构如位于布达佩斯的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对中国-中东欧关系的研究每周更新两篇左右，并且紧跟时政给出分析。由此可见，国内研究机构缺乏经费支持资政报告少有进入学术考核机制导致其研究价值不能得到认可，是导致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学者不愿意过多地进行战略性分析写作的两个重要外部因素。

## 结语

2012—2022 年是中东欧研究快速发展的 10 年，无论是中东

欧研究机构的数量、学者队伍还是产出成果均是如此。但是，中东欧研究需要培养通晓当地语言的研究型学者，应该鼓励他们进行田野调查以形成更适合该地区的理论；需要以重大问题为抓手，组织多学科学者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需要建立包括产学研在内的基金来源和包括战略研究在内的多元评价体系，以促进国别区域研究的健康发展。中东欧向来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未来中东欧的政治经济格局、我国在该地区的投资环境、经济贸易合作态势，始终是中东欧研究的重点；而基础的社会文化方面的相关研究，无论是从经贸发展、民间往来还是国家安全需求的角度来看，都是需要补足的短板。

本文原载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